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地方社会转型

Xinxing Shangren Qunti Xingcheng Yu
Difang Shehui Zhuanying

—— 以义乌为例

董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地方社会转型

Xinxing Shangren Qunti Xingcheng Yu
Difang Shehui Zhuanxing

—— 以义乌为例

董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地方社会转型：以义乌为例 / 董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 - 7 - 5161 - 1537 - 4

I. ①新… II. ①董… III. ①社会转型 - 关系 - 商人 -
群体 - 形成 - 义乌市 IV. ①F7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572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秦 艳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75
插 页 2
字 数 464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平生与两个“学”有着不解之缘，一是“学问”，二是“学生”。学问者，主要是说作为“三八式”^①的我，迄今的功与过、喜与悲、荣与辱，大体上皆因“学问”而致。观察、思考、写作以至论辩，成为我生活的基本色调，说是“学术人生”约略也不算夸张。“学生”者，显然就是指我所教授过的众多学子了。教授学生，既是我身为教师的一个基本职责，迄今已带了博士生、硕士生数十人，同时也可说是我的又一笔财富。每一位学生都是那样的鲜活、有灵性，恰似一部部展开的人生大书。在他（她）们求学期间，与他们一起讨论、共同求索，亦庄亦谐，教学相长，从而也成为我自己“学问”的源头活水之一。对于他（她）们所关注所研究的议题，在教与学的互动中，以及他（她）们自身治学的过程本身，对我而言都不啻是一种值得珍视的知识增量。

本书作者董明，正是我所指导的博士生，也是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一位。本书就是由她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来。说印象较深，不仅在于她在学的时间相对比较长，这与她在职攻读有关，也与她后来身体健康方面出现的一点变故有关；而且也在于她论文篇幅写得很长，至少是通常博士论文两倍的容量，但却仍能做得甚为细腻与规范。也是在这一过程中，让我得以更真切地了解到董明博士治学处事值得嘉许的品质：严谨、勤勉、有韧性。

就学科背景来说，董明并非社会学专业的科班，但她报考时就有明确的社会学问题意识以及清晰的求学目标，这就是：用社会学的视野与研究方法，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极具活力和张力的新生经济利益群体——新兴商人群体的剖析，力图对我国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特质有一个本土化、较为坚实的客观揭橥。应该说，这样一种学术志向及选题定位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社会学本身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彰显的就是一种对现实的关怀，

^① “三八式”是笔者对自己的一个“戏称”，即出生于1938年是也。

因而也是每一位社会学者所应秉持的学术自觉。同时，董明也具备了开展这项研究的基本条件。这不仅建基于她此前已做过相关议题的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有必要的学术研究积累，还在于她工作生活于作为我国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省。其生于斯长于斯的“惯习”及近距离可获取的最新经验事实，对于一项社会学的研究来说，无疑是必须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当然，由于调查工作的复杂性，尤其她本人在学期间身体状况曾出现的意外插曲，使得研究工作不得不一度暂时被搁置延宕。但她并没有放弃，此后再接再厉，终于撰写出了一篇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得到了论文评审专家及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之后，欣闻该论文又获得了浙江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课题的立项，并作为一部学术专著即将由我国学术领域最权威的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我由衷地为她高兴，这是对她所付出的持续不懈努力的再一次充分肯定。

我以为，董明所著的《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地方社会转型》一书有以下几点值得褒扬：

第一，调查研究扎实，写作严谨规范。能够掌握充分翔实的资料，这是任何真正的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对于以实证见长的社会学来说，则尤为凸显。作者的调查持续经年，对其调查所得，包括调查的时间、地点、被调查者情况等第一手材料，均梳理得甚是细致准确。而她写作的严谨性，包括论述逻辑的缜密、引证的规范、文字运用的字斟句酌等，相信会让每一位接触本书的读者深刻地领略到。联系到当下我国日显浮躁的社会现实背景，作者的治学立场弥足珍贵。

第二，研究方法的洽切性。作者在本专著中采用的总体理论分析框架是政治社会学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范畴之一即“国家—社会”关系，这不仅因为它较大程度上契合了当下我国社会转型中最基本的两大行动主体，即政权力量（包括中央和地方）与民间力量（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而且，正因这一框架已堪称理论经典，因而也就有可能与西方既有的社会转型模式形成某种有意义的比照对话，以便于凸显我国的独特性所在。同时，作者也并未完全拘泥于这一框架中的若干既有范式，即作者并未为此预设一个学术规范意义上成熟的“公民社会”，而只是坚持从传统国家权力的渐趋消解、民间力量开始发挥作用的视角来观察我国社会转型的基本趋向。这也就是说，作者力图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惯常思路，把国家与社会置于一个连续统之中的互动而非二元对立来进行解析，从而或能更趋

近于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之客观真实。

第三,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学术观点和独到见解。首先,作者所选择的研究案例即颇具释读意义。义乌,浙江中部一个“无中生有”、看似“莫名其妙”发展起来的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其实是“妙在其中”。对于这个“妙”,作者主要从义乌商人群体的形成发展与义乌地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地方治理转型以及地方社会秩序重构等多方面予以层层阐析,得出:

(1) 在整个义乌地方社会的变迁历程中,商人群体在其间起到了“第一推动力”的实际功效。他们主要通过持续不辍的非暴力抗争且兼具足够韧劲与政府周旋的形式,以此顽强地表达和追求其自身的利益,最终得以促成政府妥协式地积极跟进。虽然这种最原初的推进方式究其实质是义乌农民“弱者的武器”的一种力量体现,最终却演化成了推动制度创新的具有颠覆性的力量。

(2) 尽管,不可否认,由于中国国家权力的主导地位这一基本制度背景特点,无论政府处于或被动或主动的行为方式下,最终都是经由政府的政策调整或新制度的创设而得到确定,都毋庸置疑地体现了政府理性的结果,但显然,此时的政府供给已不可能完全是原先压力型体制下权力与利益之间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分配关系,而逐渐转变为政府与民间的上下互动式博弈,并且这种互动博弈的场域随着经济的弥散性而得以不断拓展,已逐渐昭示着在经济民主的推动下体现在政治民主进而社会民主层面的新进展。随着每一种新议程的出现,又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内强化着或制约着相关联的其他方面,构成一种事实上的多方互动与制衡的局面,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可逆性。正是在这种不可逆中,整个地方社会开始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其趋向现代性、面向未来的发展路向。在此研究基础上,作者又合逻辑地揭示出我国公民社会“在参与中成长”的基本发展路径,即:在“国家—社会”双方互动过程中,就社会力量演变来看,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收缩与社会力量的逐渐成长,社会转型因而主要体现为一种制度积累与渐进替代的路径,最终达至相对均衡。

第四,作者对自己的研究始终保持着必要的“学术禁欲”,从而使其研究具备了科学研究应有的信度。韦伯说过,在人类知识上要做到“学术上的禁欲”,即研究者应当明确自己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存在的局限性。“推进性”研究是董明对自己研究的基本定位,我认为这是比较客观的,也因而更具可行性。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画卷只可能呈现为渐次展开的线性路向,

因而任何研究都不能妄称已穷尽了全部真理。诚如马克思曾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① 也正因此，真正的学术研究所展现的往往是不同时代、不同学科、众多学者的前后相继，重视的是薪火相传。对此，董明有较清醒的自觉认知。所以，她在本书末尾，特别写道：“本书所完成的工作只是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过程中的阶段性事实‘记录下来，分析清楚’”，指出，“对这一主题的探讨远未终结，仍需进一步予以深化拓展”。这应视为对韦伯所说的“学术禁欲”的一种自觉践行吧！

综上，董明的这部专著所已做出的研究工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显著的现实意义。而董明对治学本身所秉持的谦逊、坚韧与开放的立场，则体现了对真理和学术不懈追求的基本品格。“即使苗儿长不成大树，我也不后悔千百次地浇灌，即使足迹被风雪掩埋，我也珍惜自己走过的路程。”这是我的人生格言，也是我对指导董明学业这一经历的自我“点评”，更希望以此与董明作为师生共勉。

是为序。

邓伟志

2011年12月16日

于上海寓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38页。

序 二

义乌，对大多数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地名，对其了解较多的人知道她原本是浙江中部一个既不靠海也不沿边的农业小县，经过短短 20 多年的发展，“无中生有”、“莫名其妙”地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所在地，全球知名的“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即使 2008 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未能撼动其一贯强劲的发展态势。然而，对于我和董明等一大批从事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不同专业研究的学者来说，义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是我们长期学习、研究、实践的重要基地，是催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一个承载着我们的感悟与思考，融入我们学术生命的宝地。

义乌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民众与地方政府之间长期良性合作的结果，而各方面专家学者的精心研究、建言献策也起了一定的助推作用。董明教授及其研究成果，就是其中年轻学者的代表人物和标志性成果之一。

董明是我在浙江省委党校的年轻同事，虽然我们所从事的专业不同，但她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就开始以政治学专业的敏锐视角关注义乌的私营企业主这个作用独特、学界又不无争议的群体，可以说，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客观对象进行跟踪观察和研究，这也促使了我对她的更多了解与认同。她早在 21 世纪初，30 岁出头的时候，就通过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对私营企业主群体进行了相当深入、系统的研究，撰写了 33 万字的专著《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通过我的推介，这部书稿很快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此后又荣获了浙江省政府颁发的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既是对她在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肯定，也进一步强化了她在这方面持续研究的兴趣。几年前，她考取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的博士生，并确定以义乌为个案撰写其社会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之后，要求长期兼任义乌市政府顾问和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我，帮她联系义乌知名企业家

及相关党政官员作为访谈对象。对于年轻学者的这一要求我欣然答应，有一次还跟她一道进行了调研。虽然她的专业与我有别，但她的研究也是总结“义乌经验”、提炼“义乌模式”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同我所从事的经济研究能取得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她的博士论文完成后，将打印稿送给我，希望我作为研究义乌的经济专家批评指正。此后，她的博士论文拿到了浙江省社科规划的后期资助立项，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她希望我为之作序。作为一个年近七旬的“老硕士”，我本没有为博士作序的资格，但面对这样富有进取心且已获得不菲成绩的年轻学者，我没有理由推却，遂怀着先睹为快的心情阅读了这部在我所十分敬仰的博士生导师邓伟志先生指导下完成的书稿。拿到这部书稿后，首先是其中对每次访谈的时间、地点、人物、主要内容等的规范、完整的记录就使我眼睛一亮，自愧弗如。继而细读全书，感到这是一部名副其实、质量颇高的博士学位论文。尤其是以下几点特别值得肯定：

其一，选题精当，方法独特。董明独具匠心地从新兴商人群体形成发展的视角来探讨我国社会转型的具体路径及其特质，且将义乌选定为具体研究案例。这一巧妙的结合和研究路径切实可行，而且兼顾了这项研究任务的学术水准和应用价值。

“新兴商人群体”是作者基于对义乌私营企业家这一群体的深入了解和分析而特别厘定的称谓。这与大多数已有研究包括作者本人之前研究中所惯称的“私营企业主群体”基本相通，但又体现了义乌经济“兴商建市”、“工商联动”的特征，也鲜明地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工业企业主及商贸经营者等多元市场主体的形成机理。新兴商人群体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现代市场经济特质的新生利益群体，其演进轨迹与整个社会的转型高度关联，而义乌作为一个有着 2230 年建县历史的传统农业小县，在改革开放后风生水起，走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前沿，董明的著作则将这两者贯通起来审视，的确极具研究的内在张力和解读空间。就这样一个论题而言，以社会学独特的宏阔研究视角较单纯的经济学研究更具优势。董明的选题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学的专业特长，又以义乌为例，这无论从定性还是定量角度考量，也无论就研究素材的获取还是讨论问题的时空边界而言，都是切实可行的。

其二，结构合理，逻辑严密。该书以义乌新兴商人群体的产生发展为主线，从他们与义乌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政府治理转型以及地方社会秩序重构的关系等多个层面，循着研究对象的动态变化，从简单到复杂、从当下到长

远的顺序次第展开，层层深入，达到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而且，其间无论是章节安排还是具体观点的阐发，都依次展开，一气呵成，体现了高质量学术专著应有的科学性、完整性。

其三，学风端正，持之有据。当今中国，学风日下已是不争之实。网上抄，书上抄，抄他人，甚至抄自己……此类丑闻实在令斯文扫地。在这种浮躁不已的社会文化生态之下，审视董明的这部著作，不能不叹服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这从其引文注释的规范详尽（仅作为注释的文字就达6万多字），实证材料整理的细致翔实，以及贯穿全书严谨但又不失平实，并不一味拔高自己的客观见解等，都可得到佐证。

当然，学无止境。尤其是正在不断发展、变革之中的义乌，无论对于研究者还是实践工作者来说，都是一本读不完的“大书”。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了1999年9月，由我陪同在我国学界享有崇高威望的老前辈光远同志（这是我们经济学界同仁对于老的习惯称呼），坐着轮椅兴致勃勃地考察了义乌小商品市场后，欣然题词：“义乌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对象。”于老的题词充分肯定了“义乌现象”的巨大研究价值。董明在从社会学的学术维度研究“义乌现象”方面，已作了初步而成功的探索。当然，与气势恢弘、前路粲然的义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图景相比，董明教授的研究成果还只能说是勾勒了一个简明的轮廓，其内蕴的深刻逻辑、多重主体及其关系的持续互动和展开，等等，都还有待随着实践的发展及研究的深化而进一步揭示、充实和丰富。我们期待董明在这一领域继续耕耘，不断学习、探索，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陆立军

2011年12月15日

于杭州·省委党校文欣校区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1)
一、社会转型内涵及本书研究对象的确定	(3)
二、问题的提出	(10)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18)
一、对中国近代商人群体研究状况的概略	(19)
二、对改革开放以来新兴商人群体研究文献的检视	(30)
第二章 个案选择及研究设计	(51)
第一节 研究个案的选择及其简要描述	(51)
第二节 研究空间和价值	(56)
第三节 研究设计	(60)
一、理论分析框架及相关概念厘定	(60)
二、研究方法	(76)
三、本书的论述结构	(86)
第三章 商人群体生成的起始路径与地方经济结构变迁	(89)
第一节 义乌经济的地理历史及其文化特质	(90)
一、义乌经济的地理历史素描	(90)
二、独特的文化传统及其精神气质积淀	(95)
第二节 经济转型与小商品市场的形成和提升	(113)
一、经济转型与传统小农经济的市场化蜕变机缘	(113)
二、农民的韧武器与小商品市场的形成	(120)
第三节 商人群体的形成及地方经济结构的演变	(140)
一、商人群体的形成	(140)
二、地方经济结构的演变	(158)

本章小结	(166)
第四章 商人群体与地方治理转型（一）：政府视角	(168)
第一节 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基本运行逻辑	(169)
一、压力型体制与地方政府的行动空间	(169)
二、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有条件正当性及其行为逻辑的主要 变量因素分析	(174)
第二节 制约与主动建构：地方政府有形之手的“张弛之道”	(179)
一、义乌地方政府创新的内在机理分析	(179)
二、义乌地方政府有形之手的“张弛之道”：基本经验阐释	(188)
第三节 治理型政府的雏形显现	(205)
一、治理型政府的滥觞及其一般要素构成	(205)
二、义乌地方政府的行政逻辑嬗变：在试错中逐渐趋向 “治理”	(209)
本章小结	(216)
第五章 商人群体与地方治理转型（二）：地方民主视角	(219)
第一节 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商人群体的特殊利益 诉求	(221)
一、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221)
二、商人群体的一般特质及我国商人群体的特殊利益诉求	(225)
第二节 商人群体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	(230)
一、政治参与动机的类型化分析	(230)
二、政治参与实现路径的多元化	(247)
第三节 商人群体政治参与程度及其绩效评析	(266)
一、商人群体政治参与的实现程度	(266)
二、商人群体政治参与对地方民主发展的绩效厘析	(272)
本章小结	(297)
第六章 商人群体与地方社会秩序重构	(299)
第一节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与社会权力结构再造	(300)
一、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概况	(301)
二、义乌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再造	(315)
第二节 城市化与地方文化精神的嬗变	(322)
一、区域城市化的脉动	(322)

二、城市化推进下区域文化精神的嬗变	(338)
第三节 民间力量成长与地方社会转型	(353)
一、民间草根力量的生长：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浮现	(354)
二、正式制度力量的回应：社会治理生态的柔韧化	(371)
本章小结	(378)
第七章 结语和讨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380)
第一节 结语：基本经验	(381)
第二节 进一步的讨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388)
附录一 访谈对象简况表（一）	(400)
访谈对象简况表（二）	(401)
附录二 义乌民营企业（商人）访谈及问卷调查（纲要）	(403)
主要参考文献	(408)
后记	(426)

第一章

导 论

虽然关于社会变迁的研究自社会学成立伊始就成为社会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但离一个能为大家所普遍赞同的理论的出现还是遥遥无期。

——[美] 史蒂文·瓦戈 (Steven Vago)^①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本研究首先把所要进行的研究置于“社会转型”这个较宏大的叙事背景之下，因为这既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更是直面当下中国社会时无可回避的基本面向。

从学术史来看，社会学的产生就源于对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种回应，是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因而它最初的使命就是描述和阐释现代社会的特征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和原因，包括出现或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并对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能的分析与解决框架。也就是说，社会学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体现的是一种对现实的关怀。故而，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应用策略研究作为自己的立学之本。这在社会学的鼻祖孔德以及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帕森斯等大师的学术研究中均得到了充分反映。迄今，社会的变迁仍是社会学的核心关注点，而且它有可能依然是这门学科当中“最引人入胜而又难以解答的问题之一”。^② 布迪厄就把社会学直接看做一门具有显著政治性的科学，因而社会学应该承

^① [美] 史蒂文·瓦戈：《社会变迁》（第5版），王晓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② 同上书，第1页。

担起其应有的使命与责任。布迪厄晚年的代表性著作《世界的苦难》(*La misère du monde*) (1993)正是他所秉持的这一价值立场的体现。作为西方社会学的一次重新定向,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 2004 年在美国社会学会年会的主席演讲中提出的公共社会学,更是强调建立社会学家和公众之间的对话机制,使社会学回到社会中。^①

20 世纪上半叶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同样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回应。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费孝通,其研究旨趣就始终围绕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他的那部在人类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正是试图描述一个典型的中国乡村社区所正在经历的巨大的经济生活变迁过程,并说明这一变迁的动力和问题。^② 1979 年我国社会学得以重新恢复,并在随后的 30 多年时间里迅速发展,也是与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步伐相一致的,换言之,中国社会的变迁呼唤着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而中国社会学最主要的研究议题以及理论发展源泉也正是中国本土的社会变迁。诚如郑杭生所指出的,“社会发展是社会学发展的源泉,中国社会发展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源泉”,因此,“研究这个(现代化)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义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③。他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成熟中的中国社会学》一文中还提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末,无源之水。”^④ 可以说,“社会转型”这一“软基本国情”^⑤ 有理由成

① 布洛维认为,如果我们承认每一门学科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利益,而这利益就是这门学科的知识所赖以立足的基础的话,那么,保卫社会就是社会学的根本利益所在。在他看来,社会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道德和政治的力量”,现已到了将社会学从学院带回真实世界的时候了。详见 Michale Burawoy, 2004,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Address: For Public Soci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6, 2005, p. 260。

②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戴可景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③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 页。

④ 《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 页。

⑤ “软基本国情”的说法是郑杭生在阐述其“社会转型论”时所提出的,即相对于人口等因素是硬基本国情,那么社会转型就是软基本国情。参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为理解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向的基本概念和考察维度。

一、社会转型内涵及本书研究对象的确定

在社会学中,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个有特定含义的术语,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其具体内容至少应该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这种转型的实现往往不是通过暴力的强制手段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完成的。^①西方社会学者曾以西方社会为蓝本,将社会转型的主要方面或主要内容概括为六大方面或“六化”^②:一是经济转型即工业化;二是社会转型(狭义)即城市化;三是政治转型即民主化;四是文化转型即世俗化;五是组织转型即科层化;六是观念转型即理性化。这样一个基本脉络,在包括迪尔凯姆、滕尼斯、韦伯、帕森斯和马克思等在内的众多社会学名家那里也得到了总体的回应。诚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其社会转型的表现方式、具体路径及其强度等都是各不相同的,但其间共通的一个基本面向则是:所谓社会转型,总体上说,就是指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③,质言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在我国,这种以现代化为基本取向的社会转型其实并非始于改革开放的当下。按吴忠民的看法^④,从1840年以来,中国就开始了社会转型的漫长历程。但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转型都是一种典型的“低度发展”状态,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总体上也仍然呈现出一种不规则、停滞甚至是落后的局面。直至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随着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基调的开始确立,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发展,中国的社会转型才真正进入了一个正常、快速和健康的推进时期。由此,一场大规模的、摄人心魄的社会变迁才真正开启大幕,其现代性特征也渐趋明朗。

诚然,当下我国的社会转型有其独具的相当复杂的特点,即结构转型

① 陆学艺、李培林:《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参见陆学艺《社会学》,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376页。

③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吴忠民:《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分析》,载《学海》2003年第3期。

和体制转轨同步进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具体又体现为：一方面是由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另一方面是由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伦理的传统型社会以及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法理的现代型社会以及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还需指出的是，这一转型过程绝非转型前与转型后的两种理想状态的“二分法”所能概括，而是处于“多元胶合”的状态，是一种传统与现代又对立又统一的新型现代化^①，因而也不是发展社会学的两个主要学术传统及由此形成的两个主要理论流派，即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所能完全观照与阐释的。^②这就使研究中国的社会转型成为一个既令人激动的丰富“题材库”与“思想库”^③，同时也因而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是非地”。仅从西方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所提供的众多理论解释框架中，就可见一斑。从倪志伟（Victor Nee，1989）的“市场转型理论”最早涉及了中国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权力基础变动问题，到随后以戴慕珍（Jean Oi，1986、1989、1992、1998）为主要提出者提出的“地方方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魏昂德（Walder，1995）提出的“地方政府即厂商”观点，王达伟（David Wank，1995）提出的“共存庇护主义”（Clientialism），林南（1996）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提出的“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白威廉和麦谊生（William L. Parish &

① 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载《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

② 孙立平认为，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不是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所能提供现成答案。这种转型是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共产主义无疑是另一种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非常不同的价值、制度和运作逻辑的制度。在这种前提下的转型，它包含了现代化的内容，但又不仅仅是现代化。如果说前两种学术传统所包含的逻辑前提均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那么，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却并非从传统社会开始。因为，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与现代性毫不相关，恰恰相反，它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独特的、扭曲的甚至是极端的反应，它是一种非资本主义式的现代性。因此，这些国家社会转型的前提就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很不相同，作为一套独特逻辑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在转型过程中完全终结。因此，需要发展出区别于前两个学术传统的第三个学术传统及理论来提供可能的答案，这就是转型理论。详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③ 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研究兴趣的日益浓烈，裴宜理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研究就有可能从一个‘消费领域’（依靠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来获得分析的洞察力）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即有能力产生令一般比较研究者感兴趣的原创性分析）。”转引自周晓虹《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